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 / 著

国民性

心理—社会的视角

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王今一 / 译

卢春龙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 955.516

20131



P1

阅 览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ALEX INKELES
【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 / 著

国民性

心理—社会的视角

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王今一 / 译
卢春龙 /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 / (美) 英格尔斯著. 王今一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3329 - 5

I. ①国… II. ①英… ②王… III. ①民族性 - 对比研究 - 德国、俄罗斯、美国 IV. ①C955. 516 ②C955. 512 ③C955.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6664 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国民性

——心理—社会的视角

著 者 / [美]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
译 者 / 王今一
校 者 / 卢春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姚冬梅 董谊思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南秋燕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姚冬梅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25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7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329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621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lex Inkeles

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Copyright © 1977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3.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ransaction Publishers,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08903.

本书根据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年版译出。

总 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 정치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 19 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 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 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基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等。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 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 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 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 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 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 从 80 年代起, 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 1988 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 而后 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 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神圣与世俗——世界范围的宗教与政治》(与诺里斯合著)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英格尔斯基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 - Social Perspective*), 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 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 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 因此, 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 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 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 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

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实际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理解《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 (代译序)

周晓虹*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生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有两个：其一是“人的现代化”或“现代人”研究，其二即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国民性（Inkeles, 1997）。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日益加速，有关人的现代化或所谓“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在此后二十年中曾一度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显学”，而英格尔斯和史密斯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更是谈论“人的现代化”时无法回避的“典范之作”（叶南客，1998）。相比之下，英格尔斯前后“求索45年”的国民性研究（Inkeles, 1997: 2），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这样高度的关注。尽管不断有人提及他与丹尼尔·列文森在1954年、1968年两版《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有关国民性的研究（参见周晓虹、张致刚，1990），但一方面由于国民性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式微，另一方面由于自鲁迅之后在中国谈论国民性或国民性的改造日渐被视为“愤青”之语，除了社会心理学界（沙莲香，1989，1990），鲜有人再对这一主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其实，上述两个主题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涉及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关注的大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

* 周晓虹，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学院院长（xhzhou@nju.edu.cn）。

话，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而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则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对国民性的理解，一样要放到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变迁角度去思考。

一 概念界定：何为国民性

“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英文写成“national character”。一般说来，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周晓虹，1997：476）。如果进一步，可以将国民性确定为“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袁洪亮，2002）。

尽管国民性或民族性格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概念，但不同学科背景 and 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概念的认同是不一样的，这与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不同有着很大的关联。尽管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承认，社会或民族、阶级共同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对于个人是如何组成社会的，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人们却分别持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唯名论者充分肯定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而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个人一旦组成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具备了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因此，它是一个实在的整体（周晓虹，2002：72）。

一般说来，对国民性或民族性格一类的概念感兴趣的学者，多为社



会唯实论者。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或民族等人群共同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他们才会进一步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安德烈耶娃，1984：30）。至于“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说法各异：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出色地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周晓虹，2002：126）；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1972：245）。与此相似，在国民性研究领域，英格尔斯也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因此他一方面肯定“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另一方面借迪尔凯姆之口强调，“社会事实必须通过社会学来解释，这是国民或群体心理差异概念的基础”（Inkeles，1997：1，8）。

与上述社会唯实论者相反，社会唯名论者严格说来是不承认社会的实在性的，因此他们也不屑研究群体心理或国民性这类问题。^{〔1〕}早在1924年，秉承个体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家弗洛德·奥尔波特在那本后来流传广远的《社会心理学》中，就借阐明“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的科学”的观点，将所有涉及人群共同体的社会心理研究一律斥之为“群体谬误”加以反驳。他不仅强调“除了属于个体的意识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意识了”，而且专门指出“国民性、共济会纲领、天主教教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是在某个个体成员身上得以表现的所谓群体心理，而是在每个个体心理中不断重复的一系列观念、思想和习惯”（Allport，1924：4-13）。换言之，并不

〔1〕 英格尔斯也承认，除了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那些临床心理学家，在学院心理学中，“直到最近也鲜有心理学家涉足国民性研究，他们对这项研究的突出态度如果不是敌视的，起码也是冷淡的”（参见 Inkeles，1997：6）。

存在表征群体心理的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它们也不过是一种“群体谬误”。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的孰是孰非，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我们的倾向是鲜明的：我们承认国民性及其他群体心理存在的实在性，但我们也承认，至今为止有关国民性究竟为何物的争论并没有完结，其中的概念厘定工作也远未完成。早在50年前，人类学家M. 辛格就提出，有关国民性的研究有三条分析路径可走（Singer, 1961）：第一条路径以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卡迪纳为代表，他们将国民性或民族性格视为一种文化性格，是一种文化成员具有的普遍性的行为模式；第二条以弗洛姆和里斯曼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性格是一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性格结构”，“是群体经验的产物”（弗洛姆，1987：357-358；Riesman, 1961：4）；第三条以林顿和杜波依斯为代表，他们欲图借助现代统计学从各种人格类型的分布中找出国民性，即找出在一国国民成员中趋于众数的那些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上述第一和第二条路径对国民性采取的只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描述；而后一条路径则希望能够凭借现代统计学给出较为严格的定量分析。受到林顿和杜波依斯的影响，英格尔斯认为国民性应该等同于众数人格结构；也就是说它应该指不同的人格变式在某一既定社会中分布的一种或数种众数（Inkeles, 1997：13）。英格尔斯的远见卓识表现在，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众数人格”视为“单峰的”，而可能是“多峰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几种，比如五六种突出的人格类型，其中有些占10%~15%的人口比例，有些达到30%。这样的国民性概念可以照顾到经济阶层、地域、民族等所有现代国家存在的亚文化多样性”（Inkeles, 1997：16）。

通过将国民性视为一种或多种众数人格，在讨论众数人格的测定方法之后，英格尔斯划定了国民性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涉及社会文化系统对众数人格或国民性的影响，包括家庭因素对童年早期人格发展



并进而对成人人格形成的作用、^{〔1〕} 非家庭因素对儿童人格发展的作用，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增长与紊乱、大众传播和大众娱乐方式等对众数人格形成的影响；其二涉及众数人格或国民性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受卡迪纳的引导，^{〔2〕} 研究者们讨论过众数人格对社会控制手段选择的影响（比如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重视耻辱感的文化，而米德认为美国文化则是一种重视罪恶感的文化）、众数人格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阿多诺认为德国人的“权威人格”是产生纳粹主义的重要原因），以及众数人格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弗洛姆就曾指出，在工业社会中，纪律、秩序和时间感是必不可少的人格特征）。可以说，正是因为意识到“人格是决定社会文化形式稳定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Inkeles, 1997: 104），后来在人的现代化研究中英格尔斯才会坚信：“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 454 - 455）。

二 从基本人格类型到国民性：研究的历史

尽管包括英格尔斯在内，人们一般将国民性研究追溯到 1934 年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周晓虹，1990；Inkeles, 1997: 16 - 17），但无论在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人类学中，都可以找到更早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述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国民性的研究，1927 年，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在《文化冲突和种族接触》一书中，就借用荣格的“心理类型说”，说明澳洲土著和非洲土著的生殖行为差异。他

〔1〕 这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家庭不仅是形式上的血缘关系系统或角色结构系统，而且是具有心理意义的关系系统，是社会组织的再生机构或弗洛姆所说的“心理代理人”（弗洛姆，1986: 369）。

〔2〕 在卡迪纳看来，代表一种文化特质的制度可以有两大层次：初级制度，包括家庭组织、群体结构、基本训练、抚育系统、谋生技能等，它们塑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基本人格系统再通过投射系统塑造了次级制度，包括民俗、宗教仪式、禁忌系统和思维方式。

认为，前者是内向的，而后者是外向的，这一差异导致前者日渐衰落，而后者则繁殖力旺盛。

尽管里弗斯不会想到他的谈不上有意识的努力会引得其后的众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将自己的兴趣投向国民性这个令人兴趣丛生的研究领域，但里弗斯及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家波亚士、萨丕尔等人确实已经意识到，个体的社会行为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制约关系。如此，生活于同一国度或民族中的不同成员是否会具有相同的同时又有别于其他国民或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这种思考的第一颗果实。在《文化模式》中，本尼迪克特将祖尼文化描述成“太阳神型文化”，而将克瓦基特文化描述成“酒神型文化”，显然受到里弗斯的启发。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心理类型的划分，本尼迪克特欲图证实“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本尼迪克特，1987：2）。从中可以推论，每种文化至少可以归纳出一种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型，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不同人格类型的研究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虽然《文化模式》一书后来遭到了人类学家维克托·巴尔诺的批评，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对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过于绝对（巴尔诺，1989：143），英格尔斯也认为“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一个完备整合的个体心理学概念，她也忽视了人格的发展方面”（Inkeles，1997：5），但这本书毕竟如戈若所说：“是国民性的科学研究的诞生标志”（Gorer，1953：247）。本尼迪克特的贡献在于，既然文化是人格在典章制度上的扩大，而每种文化都有一种以上的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研究文化去认识一民族或国民的基本性格，并进而控制人的文化或社会行为。

自本尼迪克特开始，国民性研究成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潮，并且也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与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心理学家联手进行科际整



合研究的第一个实际领域。由此，我们也可以将此后开始并历经兴衰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研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基本阶段。

（1）国民性研究的草创时期（1934～1945年）。这一阶段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一，除了卡迪纳、弗洛姆等少数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心理学家外，投身于该领域研究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文化人类学家；其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原始民族为对象的，因此此时的研究与其称作“国民性研究”，不如称作“民族性格”研究更为合适，^{〔1〕}其代表作包括：《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1934）、《人的研究》（林顿，1936）、《阿罗人：一个东印度岛屿的社会心理研究》（杜波依斯，1944），以及《社会的心理疆域》（卡迪纳，1945）。尽管具体的研究及使用的概念各有千秋，但这些研究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找出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基本人格。

（2）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1945～1955年）。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的转向和多学科学者的介入。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人类学家丢下了研究原始民族的“本职工作”，将对民族差异的自觉思考从那些落后、弱小的原始民族，投向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命运的那些现代民族和文明国家，也带动了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跟进。战争需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苏联人、英国人，也需要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反思，它给了以美国为主的“national character”研究者为自己的祖国和世界和平服务的机会。战争促成了对基本人格的界定向现代国民性研究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国家都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这10年中出版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无法一一述及，英格尔斯和莱文森也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综述《国民性：众数人格和社会文化系统研究》（1954）。

（3）国民性研究的调整时期（1956～）。自1950年代开始，国民

〔1〕 这些研究的另一个名称是“culture and personality”，后来被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称之为“心理人类学”（Hsu, 1961）。

性研究的全盛时期结束，这一领域开始呈现相对萧条的景象。造成这一结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对国民性的反省和研究本身就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定反应，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然会使国民性研究因失去了社会刺激而日渐冷落；其二，国民性研究本身存在的弊病也是这一领域失去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比如，戈若等受精神分析影响以童年期决定论来论述日本人国民性的学者，曾错误地将日本人的“强迫性人格”归因于他们早年所受的严格的排泄训练。不过，虽然出现了整体上的萧条，从局部而言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倾向：比如，文字资料虽然大幅减少，但质量上却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出现了一批评价和总结性的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格尔斯在1954年和1968年两度出版的评述文章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出版的这部《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Inkeles, 1997）一书；再比如，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唱“单弦”，那么此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甚至学院心理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一主题：人类学家许烺光出版了《中国人与美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1955），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出版了《成就社会》（1961），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1974），而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和迪安·皮博迪则分别出版了《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1983）和《国民性：关于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1985）。

看来国民性研究并不会因为其所面临的困难而失去对研究者的吸引力。尽管自英格尔斯1990年代出版这部著作以来，因为“冷战”的结束，现时的世界正在出现越来越快速的全球化趋势，但是只要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差异存在一天，人类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这种差异进行自觉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本身的兴盛和冷落则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当时面临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 英格尔斯的努力及新的变动趋势

尽管在国民性研究领域各种文献汗牛充栋，但大多数都是有关某一



国民的个案研究或某一地区（如欧洲）的比较研究，像英格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样的综合性评述性著作并不多见。因此，比较而言，这本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性研究的全貌以及英格尔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颇为有益的。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部著作共分为四编 11 章，从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研究视角、著名案例、研究方法到系统比较无一疏漏，称得上是一部国民性研究的大全手册。其中，第一编第一章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在这里英格尔斯花费了百余页的篇幅，讨论了现代国民性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切入路径。接下来，在第二编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章中，英格尔斯分别讨论了有关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国民性研究，他从“德国精神”、“俄国人格”，一直讨论到“美国性格”。再接着，在第三编的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英格尔斯关注的是国民性和人们所处的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除了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以外，英格尔斯还将对国民性的思考放在变迁的维度上，尤其是放在了因为变迁而带来的国民社会心理即心理预期改变（上升或下降）的维度上。这种预期改变的挑战性在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预期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下降的是个体对美国社会基本制度的信心”（Inkeles, 1997: 258）。多说一句，这不禁使人想到中国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极其相似的矛盾和困窘情形。在最后第四编的第八、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章中，英格尔斯将国民性的研究置于一种系统的比较之中：在第八和第九章中，英格尔斯将共时态的国民性研究与他同样擅长的历时态的人的现代性研究套叠在一起，他想说明教育、工厂经验、接触城市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所谓现代性因素对一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的重塑作用，以期说明“国家作为一个环境或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现代性”（Inkeles, 1997: 271）；而在第十章中，有关国民性的讨论进一步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不过，尽管英格尔斯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增长也将带来国民心理幸福感的提升”（Inkeles, 1997: 349），但他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而且物质条件的单纯改善也会